

文章编号: 2096-272X(2022)02-0024-07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方案的比较研究

——基于31个省市区的政策文本分析

李 琴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 通过对31个省市区的60份政策文本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省级政府在政策文本的制定上还不够规范,可操作性不强,具体表现为在高职单招考试形式、考试内容、技能考试占比、志愿填报与录取规则等方面存在着考试形式制度安排不统一、文化课考试内容不明晰、技能考试比重低,以及招录过程不规范等问题。结合以上情况,提出需从顶层设计上完善高职单招考试形式,健全考试办法和提高技能考试比重,着力提升政策制定的技术规范,以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考试招生; 高职单招; 政策文本分析; NVivo

中图分类号: G717.32

文献标识码: A

一、研究缘起

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已开始创办短期职业大学,这标志着我国高职教育正式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1],但直到2007年,教育部批准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广东省等省份在部分示范高职院校进行单独招生,高职招生才开始走向相对独立。

2014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意见》指出,高职(专科)招生总体规划和地方高校(高职)招生计划由省政府自行决定;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工作的通知》就高职招生的相关意见如下:“由省级教育部门指导有关高职院校在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中采取自愿报名、单列计划、单独录取的办法组织实施”;2020《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要求制定并完善省级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在每年春季由省级主管部门组织以高职院校招生为基础的分类考试,完善分类考试内容和形式,普及“文化素质+职业

技能”的考核方法,其中,文化素质考试、职业技能考试标准和考试方式由省级行政部门统一制定^[2]。由此可见,省级政府承担着双重责任:既在实施上级政府管理制度上扮演着政策执行者,也在自下而上的政策学习方面发挥着传输媒介作用。

现有的对高职单招的研究,多从现状一问题—建议的模式出发,从宏观上把握这一命题,如黄斌就从高职单招考试的逻辑起点、内涵目的出发,对高职单招的考试模式、命题设计、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3];另一类则是从政策变迁的视角梳理高职单招的发展,如黄文伟按照倡议联盟框架范式,对我国高职院校的招生政策进行了解读,认为我国高职院校政策变迁中存在着统一高考式、高职单招式和注册入学式三大倡议联盟^[4];最后则是以地方实践为案例,对某地所存在的问题予以剖析,如孟源北、何静就通过调查广州四所市属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情况,发现了高职院校在单独招生上还存在着评价体系不够科学、技能考试占比低等问题^[5]。这些研究已经在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还缺乏对省级

收稿日期:2021-08-23

作者简介:李琴,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

政策文本做专门性研究。省级政府是怎样在政策层面统筹设计高职单招考试的？这些政策在内容与实施机制上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本文将对此问题提出浅见，期冀为地方政府统筹设计高职单招考试提供参照。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主要以 31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下同)60 份省级政策文本做为研究样本,样本的选择遵循合规、权威和全面的原则^[6]。所谓合规与权威,即所有政策文本皆为省级政府部门所发布,以各省级人民政府、教育厅和教育考试院为主;全面,即为本研究的样本范围从 2014 年涵盖至 2021 年,为增加研究的可靠性,尤以近三年的政策文本为主体。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定性研究方法。首先,运

用 NVivo 11 plus 对所有样本进行简单的可视化分析:对 31 个省市自治区高职单招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形成众多子节点,并通过进一步的归纳和概括,得出四个一级节点,即“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志愿填报”“录取规则”,并逐一形成可视化的节点层次图。在此基础上对这四个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从而对 31 个省市自治区在这四个指标上的不同表现加以比较。

三、统计分析

根据研究设计,先对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文本进行总体分析,再从现有文件中筛选出与以上四个指标相关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

(一) 对政策文本的总体分析

如表 1 所示,本研究从各省级政府部门官网,即各省级人民政府、教育厅和教育考试院,选择了 60 份政策文本作为样本,时间跨度从 2014 年至 2021 年。

表 1 31 个省市自治区高职单招考试方案政策文本样本

序号	省份	文件名称	发文机构	时间
1	上海市	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4
2		2021 年上海市部分普通高校专科层次实行依法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方案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21
3	青海省	青海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15
4	重庆市	2016 年重庆高职单招报考须知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2016
.....				
5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关于做好自治区 2019 年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教育考试院	2019
59		关于做好自治区 2020 年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		2020
60		自治区 2021 年普通高职(专科)单独招生工作		2021

(二) 对政策性文本的统计分析

以上只是对该政策文本的一个初步分析,接下来根据 NVivo 11 plus 所得出的四个一级节点,将对这四个指标进行逐一分析,进一步分析各省市自治区的不同之处。

1. 考试形式

通过梳理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60 份政策文本样本,将 31 个省市自治区所出现过的高职单招的考试形式大概归结为以下几类(见表 2)。

由表 2 可知:首先,大部分省份仍然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

形式,其他省份则在探索与之更为匹配的创新型的考核形式。比如,黑龙江省的考试方案将面试定为单招考试的主要形式;四川省则采取“文化素质+综合素质”的形式进行考核;而山西省则明文规定招考院校可采用生源学校的毕业考试成绩作为入学成绩,且对于有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员免文化课考试,采取“面试+职业技能测试”的方式进行考核;其次,接近 1/3 的省份均有免试录取政策,这为高技能人才接受专业的职业教育打开了绿色通道。

表 2 31 个省市区单招考试形式一览表

考试方式	省份	材料来源
免试录取	贵州、宁夏、天津、云南、山东、海南、 河北、河南、四川、重庆	10
面试	黑龙江	1
面试 + 职业技能 (有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员)	山西	1
普通高考	西藏、河南	2
生源学校毕业考试成绩	山西	1
统考 + 合格性学业水平考试	北京	1
文化素质 + 综合素质	四川	1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职业适应性测试	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南、 吉林、江西、宁夏、青海、山东、山西、陕西、上海、天津、 西藏、新疆、浙江、重庆	22

2. 考试内容 另一类为三校生。对 31 个省市区不同生源群体
在考试内容的比较上，对不同生源群体进 所出现过的考试内容比较如下：
行了划分，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类为普高生，

表 3 31 个省市区不同生源群体所出现过的考试内容及省份分布情况

考试内容	省份	材料来源
考试内容一致		
语数英	安徽、湖南、吉林、宁夏、陕西、四川	6
普高生的考试内容		
文化课		
高中统考	北京、福建、广东、贵州、河北、河南、青海、山西、陕西、 上海、天津、西藏、新疆	13
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	北京、上海、西藏	3
职业适应性测试	安徽、福建、广东、贵州、河北、河南、湖南、山西、陕西、 天津、西藏	11
三校生的考试内容		
技能考试	安徽、湖南、宁夏、陕西、天津	5
未明确指示	安徽、福建、广东、贵州、河南、宁夏、陕西、浙江、重庆	9
文化课	重庆	1
免文化课考试	海南	1
未明确指示	北京	1
文化综合考试	贵州、河南、天津	3
语数、英语选考	江西、浙江	2
语数英	贵州、宁夏、陕西	3
中职统考	福建	1
专业综合理论、综合文化知识	广东	1
高职语文、数学、政治、专 业综合	西藏	1

(1)文化素质 都分为两部分进行，分别是“文化课考试 + 职业
如表 3 所示，普高生与三校生的考试内容 适应性测试”和“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考试。

一般来说，普高生的文化课考试主要以高中学考为依据，大部分省份三校生的文化课考试内容则主要是语文、数学和英语等常规科目的考试，只是在具体实施上有少许不同。比如以浙江、江西为代表的省份将英语定为选考，也就是说，如果考生所报考的专业或院校对英语成绩有要求，考生就需要加试英语；而有些省份并没有对考生文化课成绩有所要求，比如海南省就直接免文化课成绩。与这些省份不同，以安徽、湖南等为代表的6个省份并没有对生源进行详细的划分，如果考生决定参加单招考试，那么所有考生在文化课考试内容上均保持一致，即参加语文、数学、英语等常规科目的考试；西藏则又完全不同，他们的考试内容由高职语文、高职数学、高职政治和专业综合组成。

(2) 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主要是指职业技能考试在整个考试总分里所占的分值或比例。普高生的职业技能考试主要以职业适应性测试的形式进行，考察考生的职业适应性和职业发展潜能，而在三校生的职业技能考试上，虽然各省均要求组织开展职业技能考试，但在“考什么”“怎么考”的问题上并未做出具体安排，而是将决定权下放至各个招生院校，由他们自行决定。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技能考试成绩大致分为三类：①技能考试成绩不低于文化素质成绩；②技能考试成绩低于文化素质成绩；③未明确规定。运用 NVivo 11 plus 比较发现，在31个省份中，技能考试成绩不低于文化素质成绩的省份仅为8个，低于文化素质成绩的有6个，而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的省份竟多达17个（见表4）。

表4 31个省市区技能考试成绩占比情况

技能考试成绩	省份	材料来源
技能考试成绩不低于文化素质成绩	安徽、贵州、河北、河南、湖北、宁夏、浙江、重庆	8
技能考试成绩低于文化素质成绩	北京、福建、广东、吉林、陕西、上海	6
未明确规定	甘肃、广西、海南、黑龙江、湖南、江苏、江西、辽宁、青海、山东、山西、四川、天津、西藏、云南、内蒙古、新疆	17

如表4所示，在技能考试成绩与文化素质考试成绩之间，显然是文化素质成绩的重要性更胜一筹，这反映出来的直观问题是我们对技能考试的重视还只停留在口头上。但事实上，技能考试是考生迈入职业领域的第一步，技能考试的特殊性也就体现在“就业”这一特殊使命上^[7]，但显而易见，只停留在口头上重视的技

能考试并不能帮助实现技能考试乃至职业教育的“就业”使命。

3. 志愿填报与录取规则

志愿填报与录取是高职单招考试的重要一环，既关乎考生命运，也直接关系招生院校的生源质量，因此了解各省的志愿填报与录取规则是必要的（见表5）。

表5 部分省市区高职院校招生志愿填报数量要求

志愿填报	省份	材料来源
1所院校3个专业是否调剂	内蒙	1
1所院校6个专业是否调剂	贵州、黑龙江	2
20个院校志愿，20个专业志愿	云南	1
2所院校3个志愿和调剂栏	陕西	1
2所院校6个专业是否调剂	广西	1
5所院校6个专业	河北	1
不超过30个志愿，无调剂	浙江	1
限报一所院校	湖北	1
一所院校	甘肃	1
一所院校，1~2个专业志愿	广东	1

如表 5 所示，在志愿填报上，各个省份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定，每个省份均有自己的填报要求。相对而言，每位考生填报 1 所院校 6 个专业，并选择是否愿意调剂是部分省份较之其他省份更愿意采用的方案。在录取标准

上，如表 6 所示，要求以“学考 + 技能测试 + 综合素质评价”的总成绩进行择优录取的省份居多，除此之外，如果考生参加单招考试且已经被一所院校录取，那么该考生就不能再参加其他考试。

表 6 部分省市自治区高职院校招生录取规定

录取规则	省份	材料来源
被录取则不能参加其它考试	广东、江西、辽宁、山东、四川、西藏、新疆	7
未明确指示	安徽、湖北、江西、山西、四川	5
学考 + 技能测试 + 综合素质评价	北京、福建、陕西、上海、天津、西藏、新疆	7

四、问题与建议

通过以上比较发现，自 2014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办法以来，虽然各省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一些问题，尤以政策制定技术不规范，操作性不强为主要表现，这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尽快加以解决。

（一）制度安排尚不统一，高职单招考试形式还需完善

在已经收集到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出现过的单招考试形式中，“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考试形式是多达 22 个省市自治区均采用的方案，除此之外也有省份在积极探索新的考核形式，这意味着在顶层设计上对于单招考试到底如何进行其实还没有像普通高考那样形成一个普遍的、统一的制度安排，且不同省份之间对现行存在的考核形式的态度也不尽一致。以高考为例，河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在省级政策文本中明确表示考生可将高考成绩作为单招考试成绩，参加高职单招的考核与录取，然而在海南省的招生考试办法中却并不支持在高考成绩与单招考试成绩之间建立起一个等值尺度。

另一方面，探索的那些新的考试办法究竟能不能推而广之，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以黑龙江省为例，该省取消了笔试环节，而是直接以面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当然，面试或许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学生在学习职业技能上的基础和潜力，也彰显了院校在招生选拔上的自主权。但问题在于，受制于时间和人数限制，每人面试

的时间相对较短，且面试过程缺乏针对性的、全面详细的评价标准，造成考官之间评分差异巨大^[5]，致使面试过程难以做到客观公正。而如果效仿山西省或者其他省份，以考生生源地毕业考试成绩或者文化课成绩作为参加单招考试与录取的最终成绩，那么在试卷难度、考核标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不同生源群体而言，是不是做到了客观公正，也尚还存在疑虑^[5]。由此可见，只有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制度安排，在后续操作上才会更简便易行、效率更高。

（二）不同生源文化课考试内容还不明晰，需尽快健全考试办法

在各个省级政策文本里，普高生的考试内容多围绕“高中学考”、“综合素质评价”与“职业适应性测试”展开，其中高中学考成绩是普通高中生文化课成绩的主要依据。但有的省份，比如山东虽明确表示高中学考成绩并不能作为考生入学的文化课成绩凭证，却又未提出可供替代或参考的文化课考试方案，那么考试到底该如何进行，尚未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案。

另外在三校生的文化课考核上，各省也表现出了“换汤不换药”的态势。各个省份对于三校生的考试内容在名称上虽然不尽一致，如有的省份将其命名为文化综合考试，有的省份将其命名为中职学考等等，但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通常情况下，它们都是指语文、数学和英语这三门常规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是整个考试流程的核心环节，如果“考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甄选生源的选拔功能就无法发挥，办学质量就无从谈起，因此需要加快健全考试办法的步伐。

(三)类型特征凸显不够明朗,技能考试的重要性还需加强

2019年,国务院颁发了“职教20条”,正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而关于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引起了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广泛讨论。显然,目前更为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把技能考试作为其类型属性的本质凸显,且自2019年国务院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以来,技能考试如何进行也成为建立该制度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有助于凸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而高职单招作为职教高考制度中的重要考试形式之一,必然也应发挥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重任,因此,技能考试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印证。

但通过比较以上31个省市区的60份政策文本样本,发现技能考试的占比与地位并没有所预想的那么重要,在考生录取时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低于文化课成绩所发挥的作用。以福建省为例,2018年福建省高职教育入学考试招生办法中规定,中职生的文化课考试总分与固定加分在总成绩中占比70%,技能考试占比30%。而在某些省份的政策文本中甚至规定,如果考生最终分数一致,则按照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这意味着,虽然冠以“技能考试”之名,但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技能考试的特殊性,也就谈不上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除此之外,对于技能考试“考什么”“怎么考”大多数省份同样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实施办法,而是把决定权下放给了各个招生院校。这种做法虽然照顾到各个招生院校的具体情况,但增加了考生的考试成本,而事实上,这种成本也并不仅仅体现在考生的考试成本上,在组织技能考试时,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协同工作,在命题、考试、评价和录取等环节也要花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大大增加了技能考试的组织成本,而不同地区受制于条件差异,未必能够轻松承担这笔花费。再者,不同技能之间考核的难度和公正性也难以确定。职业教育是以专业为基本结构的教育形式,专业与学科不同,不同专业的内容是无法统一进行比较的,也就无法给考生一个通用的考核分值^[8],所以不同专业之间的技能

考核是否真正做到了公平公正也很难说,这就很容易引发单招考试的公平与效率之问,因而还有待商榷。

除此之外,技能考试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考核标准的同质化严重。比起“文化素质”,技能考试更注重对学生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的评价,这对于教师乃至高职院校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因为这要求在制定技能考核标准时,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甚至团队协作能力,都要充分考虑进去。但是,由于教师之间,乃至高职院校之间,都存在着个体差异性,所以很多高职院校的评价标准并不科学、不严谨,无法反映高职院校自身的特点^[9],那么为了便于操作,一些省份就会参考其他省份的考核标准。比如上文所提到的福建省2018年高职教育入学考试招生办法在大多数省份同样给予认可,此外,在海南省,国家级或者省级技能大赛得奖者、政府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拥有者可免于职业技能考试,这些奖项在其他一些省份也同样给予优待,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该不该给予优待,而是“是不是惟一”“是不是普遍”的问题。因此,如果实际执行情况与国家宏观指导长期这样呈现“两张皮”态势,那么强调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就只是一纸空文,当然,若为了强调职业技能属性而干脆取消了文化课考试,这种做法也未免过于极端。可见,虽然重视技能考试的重要性势在必行,但并不是简单一句话可以做到的,要求提高技能考试分数占比或是尽快给出明确统一的实施办法也许是可供参考的方案。

(四)志愿填报与录取规则不统一,可操作性有待增强

政策制定技术不规范,导致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也表现在志愿填报与录取规则上,几乎每个省份在志愿填报与录取上都有自己的规则。首先,在志愿填报数量上,各省市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多则30个志愿,少则一两个志愿。这也就是说,不同省份参加单招考试的考生,他们最终面临的择校机会并不是一样的,但在最终的院校录取上,各省市区的方案却是大同小异:对近一半的省市区来说,“文化课成绩+职业技能成绩(职业适应性考试成绩)+综

合素质评价”是其最终录取的参考因素，但在“综合素质评价”上如何进行评价，评价内容是什么，评价标准又是什么，由谁来进行评价，却极少在省级政策文本中进行明示。

志愿填报与录取也是整个单招考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显然在省级政策文本中并没有看到对这一环节的重视，招录过程远远不够规范，甚至还有部分省份并没有对招录办法做出明确的规定。

五、结语

在高职单招考试方案的制定上，中央政府赋予了省级政府以极大的综合管理权和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但如果省级政府也只是提出宏观发展方向，那么政策文本所发挥的实践指导作用就会严重削弱。省级政策是国家宏观政策的“配套政策”和“执行细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最终效果，因此在国家政策提出宏观发展方向以后，省级政府在制定省级政策时就需要对此进行确认和补充：首先确认省级政策要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其次对国家政策不明确或不详细的地方给予补充。这就要求省级政府在将中央工作方案具体化的同时要注重细节性、程序性规定，完善政策运营机制与政策制定技术规范，以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 [1] 张新民. 中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分期和问题反思[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0(1): 28-35.
- [2] 姜蓓佳, 樊艺琳. 省级政府高职分类考试改革方案的比较研究——基于30个省市区政策文本的分析[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9): 48-54.
- [3] 黄斌.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改革的深度思考[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4(2): 114-116.
- [4] 黄文伟. 政策学习与变迁: 一种倡议联盟框架范式——对我国高职院校招生政策变迁的解读[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2(5): 55-60.
- [5] 孟源北, 何静. 中高职衔接视角下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现状与改进策略——基于广州市属高职院校的调查研究[J]. 高教探索, 2015(4): 86-91.
- [6] 刘晖, 廖勇. 地方大学与政府关系探究——基于Z大学2009—2019年政策性文件的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21(1): 25-32.
- [7] 孙善学. 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的思考与建议[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3): 92-97.
- [8] 李鹏, 石伟平. 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的政策逻辑、深层困境与实践路径[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6): 98-103.
- [9] 袁丽伟, 王剑, 董文域.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 2013(3): 100-102.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gle Recruitment Examination Schem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Policy Text Analysis of 31 Provinces

LI Qi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60 policy texts from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texts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s not standardized, and the operability is not strong. Specifical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single entrance examination, examination content, the proportion of skill examination, voluntary filling and admission rules, such as the arrangement of examination form and system is not unified, the content of culture course examination is not clear, the proportion of skill examination is low, and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is not standardized.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situation,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single entrance examination, improve the examination methods and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skill examination from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policy-making, so as to enhance the operability of the policy.

Key words: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ingle recruitment; policy text analysis; NVivo